

试验区为什么有试验性？ 以早期燕京社会学为例的初步阐释*

□ 田 耕

内容提要 试验区是早期中国社会学历史的一个独特的方面，如何在学科史的角度更充分地认识其试验性？本文以早期燕京大学的试验区为例，从整体学术语境、观察行动和田野概念反思三个角度对试验性做出初步阐发。燕大清河试验区的建设是出于燕京社会学人的乡村研究的整体规划，同时呼应了南迁之前的燕京社会学派的课程结构。同时，清河试验区的微观村落观察表现出对乡保权力而非风俗的极大兴趣。最后，本文简述了燕京社会学人对“自然区域”概念的反思，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研究者的自我控制是进入社会学试验的关键。由此，将试验区看成不同社会学眼光琢磨的试验场或能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学生长的一个入手点。

关键词 试验区 试验性 民族志凝视 自然区域

作者田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DOI:10.14167/j.zjss.2025.12.012

一、引 言

在民族学家杨堃看来，四种田野工作在早期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社会调查、民族学调查、民俗学调查和社区研究。^①（杨堃，1997，第187~189页）其中，社会调查可为社会改造张目，也是国族建设的肇始，或是平民生活的申发，但无论哪种角色，都以社会调查所含的社会改良旨趣为前提。（Chiang, 2001; Lam, 2011）一定程度上，社会调查深入社会的程度与改良愿望成正比，但在这一前提下，其如何接触并描写代表社会问题的现象就更加值得学术史研究关注。广义的社会调查之所以具有探索意义，和其观察乃至凝视社会生活的方式大有关系，而对社会调查作为特别社会观察方式的讨论，学术史上仍有相当的空间。例如，早期社会研究绝难与社会工程或是国家建设脱开关系，那么在這一前提之下，决定社会调查探究深度的条件是什么？

*感谢张正涛同学对本文的协助，文章责任当由作者完全承担。

^①杨堃很敏锐地看到，如果追溯社区研究的理论传统，人文区位学的方式和功能主义人类学的方式有明显的区别，（杨堃，1997，第187页）而这两者的区别并不容忽略，在杨堃于1944年发表的《社会学研究法》一文中，社会调查、统计调查、民俗学调查和民族学调查都是“社会事实之描述”的方法，而英国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则是比较社会学的一个派别，是“社会事实的说明”。（杨堃，1944，第50页）杨堃的区分和吴文藻对民族志的观点有相当程度的重合，见吴文藻的《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吴文藻，1935，第416页）吴文藻此处所谓的民族志，是和民族学对称的描述性田野研究。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类可以称之为改良眼界（*reforming vision*，Porter, 2011；Merkel-Hess, 2016），即将各种生活方式都视为某一类的民情（*folkway*），考察这类民情的来龙去脉和嵌入其中的人群对之的依赖，以及这类民情和更大范围内俗和法的关系。（瞿同祖，1934；杜正贞，2018，第86页）而另一类答案则可称之为社会试验，即对特定时空范围的全景观察。被调查者所关注的社会时空，不仅产生问题也孕育了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一个社会试验室。本文关注第二类的答案，但为了凸显两者的区别，我们不妨在本文开篇处以中国社会调查的代表人物陶孟和对人力车夫的描写来看看何谓社会调查中的改良眼界。

1914—1915年，北京社会实进会在北平各区调查了北平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使用两个访谈表，总共访问了302名人力车夫。^①1917年，针对这一调查，陶孟和用英文写作了《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一文，也发表了该文的中译版本。这份报告的主体，是陶孟和对最重要的11个问题的答案的汇总，也可以说是对北平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勾勒。在陶孟和看来，人力车夫在城市劳动制度中非常边缘，但作为具体的劳动者群体则血肉鲜明，人力车夫并不是社会低端的体力劳动者，而是体现了国民道德体制中的问题，因为其生活习惯，“实为极重要之社会问题。此种职业乃剥削国民之经历，妨害人民之健康，甚且遗害及于后代。”（陶孟和，2011a，第119页）若只看此判断，陶孟和不失为道德上的现代化论者。但是，他对人力车夫作为职业群体的关注，远不如其教化心强烈，陶孟和非常敏锐地看到，社会调查需要补足历代志书对“生活之道”和“一般人民”记述不足的缺陷。（陶孟和，2011b，第60~61页）。作为综合性社会调查的先驱，陶孟和偏爱用“生活”相关的说法来称呼自己从事的调查事业，例如“生活之道”。他的改良眼界不止是提供改革之策，而是代表了一种脱离方志母体，与地方性有所疏离的研究风格，也可以说是一种以调查手法写作的专门风俗志。^②

陶孟和对“生活之道”的兴趣远多于对生活之所在兴趣，而本文的主体，在社会试验区开展的社会研究则是从生活之地开始观察社会的。下文将表明，在20世纪上半期，社会调查正是通过一系列以“试验区”之名开展的实践才得以丰富自身，并深入中国社会不同类型的生活当中。从空间设置来看，试验区可以是某一级的基层政区，也可以是不同政区的结合。尽管我们还需要对“试验区”这一说法的发端和流变进行更精确的考察，但它首先意味着超出学院体制的灵感渊源和供“学派”进行研究——特别是集体研究——的基地。在此前的学术史研究中，试验区是产生标志性研究的基础，也是“学派”生命史或明或暗的组成部分。

然而，“试验区”因为什么而有试验性？要回答这个问题却不那么容易。抗战之前的中国社会的确产生了以不同理由兴建的类似“试验区”的空间，这些空间也产生了大量的实地考察报告和观察笔记。^③“试验区”都是针对特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成立，但其标准和运行并无定法，结果也各异。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试验区意味着某种探索社会研究的空间，其所负载的“试验性”是漂浮不定的。同时，我们容易将“试验性”的问题置换为“（区域）特殊性”或是对大社

^①据陶孟和所述，A表有21个问题，B表有14个问题，且大部分问题是相同的。原稿详见Tao, L. K., “The Condition of the Rickshaw Coolie in Peking: notes on the investigation”, p.2, 英文稿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感谢沈安然同学协助复制。

^②北平社会调查所经历了曲折的组织变迁，它在学科史上的贡献远不止狭义的“社会调查”方法。关于北平社会调查所1926—1934年的组织变迁（即学术重心）的变化，参见田耕（2019）、沈博（2023）。

^③例如，1932年，民国政府内政部的风俗调查纲要出台的时候，在时任市长沈鸿烈的倡导下，山东青岛市先后成立了李村、九水、沧口、阴岛、薛家岛等乡区建设办事处，这些办事处既推动乡村建设，也成为风俗调查在乡区的推动者。（牛和清，2011）而《李村区风俗调查报告》（原载《（青岛市）乡村建设月刊》1934年第1卷第6期，收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第24册，第427~432页）却没有止于比照内政部1932年的风俗调查纲要进行问答，相反，调查不再是问答记录，而是将问答与对当地的观察结合起来，问答体和填表式的报告痕迹开始变弱，而民族志观察的色彩大大加强了。

会的“代表性”问题。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研究试验区所在的空间对于理解大社会有什么意义的问题。在小社区对大社会的代表性问题当中，在哪里设立试验区变得很重要，试验区如何探索性地观察社会就退居次要了。

需要指出的是，以“试验”（experiment）或“试验室”（laboratory）来认知社会研究并不是中国社会学独自面临的状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种将社会研究类比于试验，在试验区域中反思真实社会生活的看法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的运用，在1930年代或者说“大萧条”之前形成了某种高潮。（Owens，2014）学术史家一度将“试验室”的譬喻视为科学主义在这一时期社会科学中兴起的象征，（Ross，1991；Camic，2007）而这种科学主义的话语又成为将社会科学研究和此前进步主义时代的改良学问区分开来，促成学术职业化的动力之一。

不过，将试验区视为学院派社会科学兴起的前兆，将试验性归结为早期科学主义的说法难以解释早期中国社会学的诸多问题。例如，即使我们承认和“试验”相关的说法代表了某种科学主义的主张，但也很难解释为什么“试验区”包含了差异很大的研究类型。以下文所聚焦的燕京学派为例，无论是在燕京学派著名的清河试验区之内，还是在同为燕京社会学人主持的清河试验区和平郊村试验区之间，都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差别，本文的第二和第四小节将更具体地表明这些差异。简而言之，这些差别并不能诉诸于探究社会学是否追求科学，甚至不能完全诉诸于具体的研究路径，例如人文生态学和功能主义的差别。（傅春晖，2021；王铭铭，1997；王铭铭，2016）试验区并不是因为社会试验的成功，而是因为包含了各种富有意味的差异而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研究演进的一个入手点。

回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研究的“试验区”一方面是追求深度观察社会生活的空间，即所谓的田野。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寻找某种控制的空间。控制又包含了两重意义：一重是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空间的控制，实则是某种干预，通常所说的社会改良或政治改革也都在此之列；而另一重则是施诸于研究者自身，使其形成和研究对象具有某种适宜关系的控制力。^①（Gieryn，2006）在上述含义中，最受学术史关注的莫过于作为某种干预进而改革的空间的试验区，无论这种改革是特定改良理念与地方政治结合的产物，（Rodgers，1998；Recchiuti，2006；侯俊丹，2018，第207~211页）还是出于行政变革的需要。（Merkel-Hess，2016）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史研究还是社会学史研究，无论对干预的效果作如何的评价，自20世纪中叶以来，对1930和1940年代乡政和县政的典型“试验区”的研究（例如定县、邹平和北碚）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样，经典芝加哥学派的《城市民族志》中，除了作为田野对象的芝加哥，作为城市设计对象的芝加哥也同样引人关注。（Venkatesh，2001；Sampson，2012）而与之相较，试验区如何成为田野，又如何促使研究者通过自我控制而真正成为研究的一部分，这两个方面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在科学史研究的启发之下，（Daston，2008）本文将从一个观察行为的角度来重新理解早期燕京学派调查实践中的清河试验区，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尝试回答早期中国社会学史中的试验区具备何种试验性的问题。

本文的第二小节将把清河试验区重新置于燕京大学（简称“燕大”）社会学致力于乡村研究的整体设想当中。在发展社会学田野点的同时，早期燕大社会学的课程设置强调了社会学民族志的教育，而且初步整合了燕大农村研究的力量，提出了首先推进的研究议题。清河试验区的出现

^①研究社会调查历史的学科史家马丁·布尔默（Martin Bulmer）很精准地指出，相比对个人生命史和档案的运用的说明，如何进行类似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反思要少得多，因此，保罗·克莱西（Paul Cressey）的作品《出租舞厅》（*The Taxi-Dance Hall*）是少有的对身为不同类型的陌生人怎么接近田野去观察的方法反思，而在一本同样遵循生命历程方法的著作中，兼有这一点尤其难得。（Bulmer，1983）

恰恰是这些本身深具探索性的措施的结果。第三小节则指出清河试验区区分了市镇和乡村的不同调查层级，其对村镇社区的不同层次的关注，在此后的社区研究中得以延续。本节还以蒋旨昂在战前和战时对乡村公所的观察为例，说明了这一连续性。第四小节将把清河试验区中所见的社会学观察和同时期燕大社会学的理论思考结合起来，在清河试验区设置的背后，以赵承信为代表的燕大社会学研究者对诸如“自然区域”（natural area）等概念的反思和他们在试验区中致力推广的社会学观察关系密切。正是通过这样富有理论性的思考，1930年代末的平郊村试验区才明确提出将研究者作为社会观察一部分的方案。

二、试验区的轮廓：燕大农村研究计划和社会学的课程设置

（一）清河试验区和燕大的农村研究计划

颇具巧合的是，赞同陶孟和的调查理想，但在学术旨趣上很不相同的两条道路都在1928年开始起步。这一年，李景汉接受“平教会”的邀请，在定县开始主持社会调查。同一时间，燕京大学也开始在北平郊区的清河设立社会研究的试验区。系主任许仕廉决定在北平郊区的清河镇展开调查，另一位燕大社会学的教授杨开道和他指导的学生余协中、张光禄和万树庸成为调查的主力，这5人组成了清河调查委员会。^①清河调查委员会拟定的调查大纲包含了12方面的问题，为1931年清河试验区的正式成立打下了基础。跨越了3个县区（宛平县、昌平县和北平市北城郊），3万余人口的清河镇就此成为燕京社会学第一个知名的田野试验区。清河试验区的第一任主任张鸿钧本是燕大社会学系的毕业生，在他任内，清河试验区分为社会服务、农村经济、农村卫生和农村调查四股。最迟在1933—1934年，燕大社会学系和另外两个著名的乡村试验区域——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定县平民教育试验区——建立了合作。^②

虽然清河试验区的设置针对了当时诸多的实际问题，但它首先是一个面对调查的社区，这样一个社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空间单位呢？李安宅认为它是自然社会区域，首要特征是人口分布的单位。在李安宅看来，社会研究是从社会问题出发，而研究每一类社会问题最终都要落实在特定的社会，即“以社会事功为立脚点”，但在社会问题之外，社会研究还“用自然社会区域为工作单位”。^③（李安宅，1933，第35页）这个自然社会区域虽然取自人文生态学，对李安宅来说却表示一个人口分布的单位，即“按中国社会的情形，两万五千人到三万五千人的区域”。（李安宅，1933，第35页）这么来看，居住人口有三万人的清河镇自然成为一个合理的工作单位，在这个单位当中，“用整个人口和社会组织来作试验工作”，就是清河试验区的工作意义所在了。（李安宅，1933，第35~36页）

而对许仕廉和杨开道来说，清河试验区的空间性在于其与四周的联系方式，人口规模是很次要的因素，在他们的设计当中，清河调查不仅没有明确的政区边界，而且有意识地不把基层政区作为社区的代名词，希望清河试验区的调查构成一种研究“自然史和人类社会之特征”的社区研

^①燕大社会学系的元老步济时(J. S. Burgess)在1928—1929年秋季学期也参与了清河调查。(许仕廉、杨开道, 2019, 第II页)

^②《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系1933—1934年度报告》(原载《社会学界》第8卷, 1934年), 收入国家图书馆:《燕京大学学术期刊汇编:社会学卷》第4册, 2009年, 第629页。关于试验区下各股的具体设置, 见张鸿钧在1934年乡村建设讨论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镇社会实验区工作报告》。(张鸿钧, 2018, 第41页)需要指出的是, 在张鸿钧的报告中, 多数作“试验区”, 包括报告题目在内的少数几处写作了“实验区”。下文中出现“实验区”字样, 不再一一解释。关于燕京大学的清河试验区的历史, 参见侯俊丹(2017, 2018)。

^③这是1933年《国际劳工消息》编辑邀请许仕廉介绍燕大社会学的情况, 许仕廉请李安宅代写的一个文章。

究。^①（许仕廉、杨开道，2019，第1页）这个人文学生态学意味更明显的看法已经暗示了镇一村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将在下文详细展示这一点。

“清河镇距北平德胜门十八里，位于四十村之中心，距各村平均约五里，最远者十二里，最近者一里，该镇不但居全区之中央，且为四十村之商业交通中心点。我们就以这四十村所包围的区域，作实验区，区部设于清河镇上。”（张鸿钧，2018，第38页）

除了建设试验区这个集服务和社会学田野为一体的空间，燕大社会学系也在同一时间着力扩充了横跨院系的乡村研究项目。1932年，燕京大学成立了“社会与人口研究委员会”，许仕廉任主席，但这个委员会并不附属于社会学系，而是一个专门围绕北平附近和华北各省农村的研究平台。人口、家庭、诉讼、借贷、组织、农村副业、娱乐与思想等都在委员会的研究计划之列。与试验区的田野工作相比，“社会与人口研究委员会”更加致力于挖掘乡村社会研究的议题。第一批的重点包括青苗会、印子钱、祖先崇拜和农村诉讼。（《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系1932—1933年度报告》，2009，第301页；许仕廉，1933；黄迪，1938，第361页）

1933年，燕大社会学系主办的《社会学界》在第七卷中刊文，总结了建系以来社会学系的组织和学术方向，明确了清河试验区和乡村研究委员会代表燕大社会学的两个基本方向。文章指出，社会学研究技艺的培养有两个立足点，一个是以各种实质的社会领域为立足点（文章所谓“社会事功”），如土地问题、工业问题、粮食问题、娱乐问题等。另一个则重视如何整体性地理解社会，而对象则是“以人口分布的单位为立脚点，用自然社会区域为工作单位”。（许仕廉，1933）前一个方向促成了各种专门研究的展开，后一个方向则与社区研究的概念基础有关，即什么样的区域空间构成了社区研究的对象，其构成何以不同于经济区、商贸圈、生态区等一般性的空间。

1934年，燕京大学成立了农村建设科，在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农村社会学家杨开道看来，这一超出了社会科学中致力于乡村研究的学科，成为“整个大学的工作”。^②（杨开道，2018，第623页）从杨开道的报告来看，农村建设科其实是综合了燕京大学各学科力量，致力于农村研究的一个专门项目，这在本科和硕士学位的教学以及乡村研究等三个方面均有体现。^③燕大试验区的确产生了大量有意思的调查报告和学位论文，而跨学科形成的乡村研究的主题更是超出了社区民族志的范围，包含了不少重要的主题。例如，在农村诉讼方面，社会学系在1934年就完成了对通县某村30余年的冲突的追踪和分析，形成了10万余字的报告；在拜祖方面，林耀华为硕士论文而在家乡福建义序进行的宗族研究就是该计划的一部分。

（二）燕京学派的社会学民族志教育

如果我们将视线从上述专门项目和特别试验区扩展到燕大社会学的课程设置，那么，上一小节所述的改变似乎并不意外。在太平洋战争迫使燕大南迁之前，燕大社会学系的确是一个以社会学民族志为教学重点的院系。从建系到离开北平南迁的20年间，燕大社会学的课程体系分为两大部分——“社会生活之各方面”（类似今日所谓分支社会学）和“理论与方法”，二者所包含的课

^①许仕廉称ecology为“境地研究”，即以“地域组织为对象”的研究，以此区别于“以行为为对象”的个案研究(case study)。不过，这种区分是在他所谓理论社会学的部分进行的，而不是一种社区研究的方法。（许仕廉，1933，第305页）在田野工作方面，清河试验区的人文生态研究仍然有相当部分接近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改良理想。（黄迪，1938，第361页；《社会学系近十年概况》，1948，第245页）下文将表明，人文区位学和一般性的社区研究方法剥离开来，成为更成熟的社区研究的核心观念，正是赵承信等更年轻一辈的燕京社会学人的努力方向之一。

^②引文参见《燕京大学农村建设工作》，该文系杨开道在定县举办的第二届乡村工作讨论会上的发言。

^③在燕大的本科方案中，学生前两年进行一般社会学的学习，第三年则集中进行和乡村有关的分支社会学或社会研究专题的学习，第四年则要选出一个专门的主题，“使学生自出题目，自找材料，自成系统，以训练其独立研究之方法。”（杨开道，2018，第204页）培养乡村工作的研究生项目则将第二年设置为学生的实习期，实习地点除了清河试验区，大部分是“国内外农村建设实行机关”。（杨开道，2018，第205页）

程数目大致相当。在这个课程体系当中，4门基础课程共计15学分，“农区社区”（赵承信主讲）和“都市社区”（赵承信、黄迪主讲）各占3学分，如果算上人类学色彩较重的“初民社区”，那么社区研究的课程就占到了基础学分的三分之二。（《社会学系近十年概况》，1948，第241页）在燕大的基础课程结构当中，“理论与方法”之下只有方法论课程和实践类课程，无论是社会学理论还是社会思想史类的课程都没有常设。^①（《社会学系近十年概况》，1948，第241~242页）

这个课程的设置和以清华社会学为基础的西南联大社会学形成了有意思的对比。在清华社会学的课程设置中，社会学民族志部分不突出，但对社会思想和制度相当重视。当谷苞和胡庆钧两位学者在西南联大开始各自学业的时候（1937年和1938年），西南联大的社会学置于历史社会学系之下（1938—1940）。从联大社会学课程的设置上看，除了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法两门课之外，“社会学原理”“（普通）人类学”“西洋社会思想史”“人口问题”“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学”，再加上作为学生实践的“社会机关参观”和毕业论文，构成了社会学本科的必修课程。^②

在不因教师去留而变的必修课程之外，我们还需同时留意学者开课的选择。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的几位核心学者中，陈达一直主持人口问题和劳工问题，而人口问题这门课，即使在陈达无暇分身的时候其也并未缺席。在西南联大社会学刚建立的时候，高级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法入门的主讲人都是李景汉。到了下一学年（1939—1940），社会调查分为初级和高级两门，也由李景汉讲授，社会研究法和社会调查的课程，在李景汉离开西南联大后由陈达接手，社会调查合并为一门课，这两门课仍由同一位教师讲授。同样，在出身清华社会学的李树清任教西南联大的五年间，乡村社会学、社会变迁和社会制度三门课都由他主讲，到了1945—1946年，李树清再度留美攻读博士学位，3门课统一由费孝通接手，至于费孝通在前一年才开讲的社区研究和民族学两门课，虽然更接近他本人的学术训练，却不得不暂停。兼任西南联大教务长的潘光旦，虽然只开西洋社会思想史一门必修课，但他开课的搭配却非常稳定：优生学（优生问题）和中国社会思想史（间以“儒家社会思想”之名开设）都从未间断，再辅以家庭问题，这一课程搭配完整地将潘光旦的社会学理念在西南联大的课程中传达出来。

在燕大客居成都华西坝期间，社会学系的课程设置才全面起用了分支社会学的名目。1945—1946学年的课表中，社会学和社会行政方向本科生的必修课为社会学导言、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统计学等9门，社会学方向的选修课程也为9门，包括农村社会学（徐雍舜）^③、都市社会学（黄迪）、边疆民族学（林耀华）、教育社会学（廖泰初）、家庭社会学（林耀华）、知识社会学（李安宅）、理论社会学（黄迪）、边疆语言（李方桂）、中国社会制度史（黄迪），选修课的授课教师中，除了李方桂先生为客座，其余都是社会学系的专门教师。^④（《社会学系近十年概况》，1948，第242~243页。）南迁之前和北返之后，社会学系的课程都没有以分支社会学来命名课程。

^①1935—1936年，严景耀也在社会学系开设了一门“社会运动自然史”的课程，并首选四年级、五年级的学生上课（三年级学生选课需经批准），这事实上成了一门很有实践性的课程。从承担的课程数来说，杨堃独自承担6门课程的教学，外加3门和另外一位教师合上的课程，赵承信独自承担9门课程的教学，外加3门和另外一位教师合上的课程，他们是社会学方向授课量最多的两位教师。两人合授社会学方向唯一的一门研究生课程——“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班”（两学期计6学分）。而杨堃讲授了两门知识上很特别的课程——“民族志”和“中国社会史”，这或许是他影响和指导了很多南迁之前燕大学生的民俗研究的原因之一。

^②西南联大社会学的课程目录，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1998）“社会机关参观”一课，为社会学系二年级必修，“先由讲师提出参观教学计划，每周星期六下午由教师带队参观，参观后一周内写出参观报告。”该课程的指导教师，从1938—1939年至1944—1945年依次为苏汝江、李景汉和李树清合开、晏升东、李植人、袁方。（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2006，第240~241页）关于南迁之前清华大学社会学的课程，见1935年毕业于清华社会学系、后又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书的李树清的回忆。（李树青，1984，第63~68页；李树青，1985，第70~74页）

^③括号内为该课程的授课教师名称，下同。

^④返回北平之后，燕大社会学系主要是用“某某与社会”来命名课程，这样的课程占到了5门，分支社会学的名称则一个也没有。

1947—1948年的课表当中，战前作为基础课的初民社区、农村社区、都市社区和边疆社区再度回归。

本节将清河试验区的出现放回燕大社会学整体的农村研究计划和院系的课程设计中，表明清河试验区虽然包含社会行政改良的设计，但它首先是一个供社会学观察的田野。试验区的出现不是跨越学科，而是当时学科发展的一个要求。简言之，本文以燕大社会学上最知名的试验区——清河试验区为例，试图说明试验区的“形式”并不只是其空间界限，也不是由某一种主导学说（例如上文引用的人文生态学）来决定的，它的轮廓是由其背后的研究架构和设想推出来的。

田野和进入田野的观察眼力是相互构造的，这一点是社会学的常识。如果说试验区是一种特别的田野设置，那么在其中能实现什么样的民族志观察呢？清河试验区实质性地促成了什么样的田野观察？在下一个小节中，我们将从如何在村落调查中观察权力这个例子来对以上内容进行说明。而在进入到这个实例之前，我们仍要把试验区民族志的视野凸显出来，再把具体的观察实例放回其中。

三、试验区中的社会观察：以对村落权力的田野工作为例

（一）从乡镇到农村的三条脉络

上一小节表明，清河试验区的设置并非简单出于“走向田野”的经验取向，更不是一种近世科学和国族结合的现代性产物。田野除了接纳不同学术理念和改革理念的人，它本身的地方性或者说社会形式也要进入学者的思量之中。这种作为社会形式的地方性如何在社会研究的纹理中展开，构成了理解试验性的另一个面向。从这一点来看燕大社会学的试验区，则不难发现，在其中开展的社区研究作品是围绕着乡镇和农村的不同而展开。下文的表1总结了燕大社会学人围绕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和研究。

这个区分和燕京学派最为人所知的学术遗产，即社区之间的连接性问题有关。对同在燕京大学求学的李安宅、黄迪和赵承信来说，跨越政区边界的清河除了是行政改革的示范区以及乡村研究的田野基地之外，还包含了一种新的值得社会学努力描述的社会关系，三人将这种以空间作为比拟的关系称为“村—镇社区”。（Li, 1938, pp. 125-126；赵承信，1936，第193页；黄迪，1938，第362页）而乡镇和农村的联系此后在燕京学派的谱系中大致体现为三个脉络：

首先，是将不同层级的市场作为村庄之间的生态枢纽，以市场或赶场而不是村落作为社区的边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南迁到成都华西坝的燕京学派的研究当中。^①（施坚雅，1998；Liao, 1946）其次，是费孝通在著名的“乡脚”概念中表达的，乡镇和农村之间富有生产性，而不是基于消费的联系。（费孝通，1987）^②此后，费孝通在1980年代提出的“小城镇”学说则进一步注意到小城镇位于不同的行政等级上（所谓“三层五级”）的现象，初步提出了市镇和政区形成的视角。（费孝通，1984）最后一个思路则是以村落为中心，在向上和向下的方向上寻找村镇社会中的公所会社等组织的社会根源，尤其重视其行使正式权力的价值和正当性。抗战后期形成的“绅权”之说，就是从组织、身份和权力三个角度总结这个思路的体现。1946年，费孝通在《美国社会学杂

^①赵大琳(2022)仔细地梳理了抗战期间从北平南迁到成都华西坝的燕京社会学人事迹,发现蒋旨昂和廖泰初扩展了此前基于华北市镇的社区研究,而施坚雅的成都田野笔记则表明,市场等级理论直接受益于“华西社会学”的这种扩展。

^②这个说法也在江南市镇经验研究中被借用,指那些直接被市镇辐射下的乡村社会。(滨岛敦俊,2007)

表1 燕京大学社会学村落调查(部分)

村名	作者	调查报告或论文	出处
黄土北店村(北平清河镇)	万树庸	黄土北店村的研究	燕大社会学硕士论文,1932年,导师杨开道
许村(山东莒县)	李鼎	山东莒县的许村(许家庄)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1期,1933年9月6日
许村(山东莒县)	李鼎	山东莒县的许村(许家庄)(续)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2期,1933年9月13日
解家庄(山东莒县)	李鼎	解家庄(一)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9期,1933年11月1日
		解家庄(二)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10期,1933年11月8日
解口村(河北永清县)	梁桢	解口村大秋青苗会之概况(一)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12期,1933年11月22日
		解口村大秋青苗会之概况(二)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13期,1933年11月29日
		解口村大秋青苗会之概况(三)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14期,1933年12月6日
		解口村大秋青苗会之概况(四)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15期,1933年12月13日
问家庄(山东郯城县)	黄孝方	郯城县问家庄述略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14期,1933年12月6日
		郯城县问家庄述略(二)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15期,1933年12月13日
		郯城县问家庄述略(三)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16期,1933年12月20日
		郯城县问家庄述略(四)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18期,1933年12月27日
崔蒙村(山西屯留县)	李炳卫	山西屯留县的崔蒙村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18期,1933年12月27日
卢家村(北平清河镇)	蒋旨昂	卢家村	燕大社会学学士论文,1934年;《社会学界》卷8,1934年
大王褥村(河北定县)	张析桂	定县大王褥村社会组织概况(一)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19期。
		定县大王褥村社会组织概况(二)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20期,1934年1月24日
太子务村(河北武清县)	(无署名)	太子务村(一)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24期,1934年2月28日
		太子务村(二)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25期,1934年3月7日
		太子务村(三)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27期,1934年3月21日
大王褥村	张析桂	一个村庄土地问题之研究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36期,1934年5月30日
清河镇左近四十村(北平)	燕大清河试验区	礼俗调查的尝试(一)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40期,1934年6月27日
		礼俗调查的尝试(二)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41期,1934年7月4日
		礼俗调查的尝试(三)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43期,1934年7月11日
		礼俗调查的尝试(四)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46期,1934年8月1日
		礼俗调查的尝试(五)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47期,1934年8月8日
		礼俗调查的尝试(六)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48期,1934年8月15日
		礼俗调查的尝试(七)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49期,1934年8月22日
		礼俗调查的尝试(八)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50期增刊,1934年9月5日
定县八村(河北)	张析桂	河北定县八村土地问题的研究(一)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56期,1934年10月17日
		河北定县八村土地问题的研究(二)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57期,1934年10月24日
宁晋县各村(河北)	杨翰卿	河北宁晋县的婚嫁风俗(一)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67期,1935年1月9日
		河北宁晋县的婚嫁风俗(二)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68期,1935年1月16日
		河北宁晋县的婚嫁风俗(绪完)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副刊,第70期,1935年1月23日

志》发表《农民与士绅》一文,总结了“魁阁”学人在云南探索这个问题的一些集体经验。^①(Fei, 1946)

对上述三个思路的整体反思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结构,当撰文专述之。这里将集中探讨第三个方面,即对村落权力构成的田野观察促成了什么样的民族志观察。虽然这个议题在燕京学派的学术史中是通过《皇权与绅权》这本战后出版的文集而广为人知,但其学术的发源则是在战前的清河试验区。对乡村权力的田野观察也并非由对缙绅的历史反思所致,而是由20世纪上半叶几次乡村自治中的“乡保”设置所触发。清河试验区中的村落调查已经体现了这一点。那么,试验区的民族志观察是如何将对这一变化的敏感放进一个对村落的整体描述当中的?下文将以蒋旨昂在燕大

^①费孝通领导的“魁阁”成员在这个问题上的代表研究,可参见谷苞的《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胡庆钧的《汉村与苗乡》。(谷苞,1943;胡庆钧,2006)

的学士论文《卢家村》和其后期的《战时乡村社区政治》为例进行说明。

（二）从“卢家村”到“战时乡村社区”

《卢家村》是蒋旨昂的本科毕业论文（1934），呈现了位于北平清河镇北八里的卢家村的社区样态。蒋文从卢家村的地理入手，继以人口、家庭、经济、教育、宗教、休闲、政治，共计八章，而人口、家庭、经济、教育和政治这五章尤其详尽。从观察触角的敏锐程度来说，《卢家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方面的描述和分析——家庭和社区政治。

虽然“人口”一章分为家庭人口和非家庭人口两节，但后者只有寥寥数语，因此对人口的描述可以说是《卢家村》描述家庭的第一步。在“人口”“家庭”两章节中，蒋旨昂进行了充分的统计调查。例如，在“家庭”一章当中，除了大量的访谈和观察所见的个案描写，蒋旨昂对全村55户人口的行系（即一家的人口是否属于家主的直系亲属）和世代分别进行了统计，列出了行和代的分布表，这是对家户规模更细致的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在《卢家村》的全部文字当中，风俗不仅没有成为独立的一章，各章中关于风俗的部分也相当紧凑。无论是宗教还是娱乐，都是全书中篇幅最为短促的部分。而作为礼俗的核心，“婚生丧祭”的风俗虽然保留下来，但也只是家庭“纵的方面”的一环，甚至没有构成家庭一章的独立小节。（蒋旨昂，2023）蒋旨昂的这篇论文多少体现了和制度性的习俗——不管是典仪还是更加民间形态的风俗——的距离，而不从风俗上说明问题的做法，在抗战时期燕京学派的社区志发展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我们在下文中将再谈这一点。

与压缩风俗形成反差的，是《卢家村》对社区政治的强烈兴趣。“政治”这一章完全围绕乡公所这一民国二十年（1931）年之后的基层政治设置来写，突出了乡公所的有名无实。卢家村的人口只有法定设乡标准的一半，但也编成了昌平县7区38乡中的第24乡。乡公所嵌进了昌平县45村的传统结构，也就打乱了稳定的县一村结构。蒋旨昂从一开始就暗示，这样的基层组织变革，要么是新瓶装旧酒，要么是新不如旧：

“乡公所的组织是乡长一人，调节委员三人，监察委员三人，财务委员二人，职员当然还是以前公会中人。此组织不久也就消灭，只有庙中房窗外尚遗有调解委员会字样。庙门尚挂的‘昌平七区第廿四乡乡公所’的蓝地白字木牌早已扔在一边了，这组织除调节监察两委员会外都是以前就有的，略一变名而已。如财务委员就是以前公会中管账的。写账的虽然常换，如自民四至民八十是一个油盐铺学过徒的人（会写会算）办理，以后老塾师写，以后教员写，最近李永写，而管账的一直是李七。”（蒋旨昂，2023，第232页）

蒋旨昂对卢家村的政治从组织和人两部分切入，前者的基本发现是“复杂的组织似乎不能被乡村接受，事实上，卢村乡公所是越来越简单了”。（蒋旨昂，2023，第233页）对基层组织建设的怀疑，反过来刺激了社区志作者们去发现不能被改革失败所废的乡村秩序。初涉社区研究的蒋旨昂只在“政治”一章中以“领袖关系”一个小节表达了这一点，但是这一观察并没有止步于卢家村。当他离开燕大，完成了在美国的留学，因为抗战而辗转到重庆之后，其燕大学士论文中的一小节终于变成了“社区政治”的主题，其着眼点也从战前失败的乡公所改制，变成了更充分的“社区政治的变迁”。而士绅和领袖、自治组织和行帮组织的关系，则成为战时社区研究进一步反思社区权力和道德的主线之一。

蒋旨昂从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先是留学美国西北大学，回国后又到山东投身于县政服务，再到以乡村建设研究院教师的身份兼任贵州定番县县政府收发以及第三区（摆金）区长。1939年9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标志着所谓“新县制”改革的开始。不到一年后，蒋旨昂所在的乡政学院于1940年6月离开贵州，迁往重庆北碚。蒋旨昂在“陪都迁建区”选择了两个社区——巴县的歇马场和璧山县的来凤驿——进行调查，写成了《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

这一报告保留了很多源自战前燕京学派社区分析的手法，但当蒋旨昂对乡本身进行观察的时候，乡保长的问题更加突出了。1928—1939年是所谓“乡里邻闾”制度下的自治阶段，这两个社区是“里”（里长为首），往下再分为乡（闾长负责）。而在“新县制”颁布之后，自治寓于乡保之中。乡设立乡公所，歇马场重新编为16保，来凤驿重新编为13保。县以下，无论是“乡联保”还是“镇联保”，都将行政工作的末梢放在了保上面。在“新县制”下，最紧迫的问题是自治的训练项目能不能造就县政建设所需的人才。在这个问题上，蒋旨昂留心的是“绅权”如何退出基层社区的政治，使得受过行政训练和有政治素质的领袖能够在其位而谋其政。^①以这两个乡的士绅出身的乡长为例，蒋旨昂强调在基层政区分政治领袖和行政领袖：乡长是政治领袖，而中心校校长和国民兵乡队队长则是专门行政领导者。蒋旨昂认为这三个职务由乡长一人担任是混淆了政治和行政领导。（蒋旨昂，2023，第71页）而这个判断和写法与《卢家村》有相当的连续性。

同时，风俗在两个社区形成中的作用则相当模糊，这一点和清河试验区时期的做法一致。蒋旨昂以“生活惰性”和“历史重力”来称呼之，两乡的风俗和民情也几乎不在其社区观察之列。即使置身于正月初八到十五举行的龙灯会中，即使对花火和龙灯下的舞者有细致感性的观察，蒋旨昂对社区描摹的核心还是制度，而不是风俗的渊源或集体过程。（蒋旨昂，2023，第95页）

在本小节当中，我们回溯和比较了蒋旨昂在不同时期如何对乡和保的权力进行社会学观察。这个例子表明，即使在这样一个微观的观察中，社会事实的根基是“耐看”（即推敲式地观察）而不是自然涌现。因此，如果说试验区提供了独特的社会学田野，原因不在于它提供了某种干预之前的生活秩序的标本，而在于试验区提供了新的观察方式兴起的动力。而在这种民族志的凝视之下，潜藏在一个地理或是行政区域单位下的社会整体性因此慢慢浮现，这是芝加哥学派和燕京学派都曾使用的自然区域的基本含义。那么，要实现这样的民族志凝视，田野观察者又会有怎样的自觉意识呢？在下一小节当中，我们将表明，这种凝聚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气质的“自然区域”概念与研究者的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自我控制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正是1930年代燕京社会学人的学科自觉所在。

四、试验区和实验室：对自然区域概念的辨析和发展

正如上文指出，早在1933年，燕大社会学系主办的《社会学界》在第七卷中就用自然社会区域（natural social area）来表明整体性地理解社会的重要性。自然区域之说流行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都市民族志，其核心人物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在总结邻里概念的时候将自然区域视为凝结了一定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小社区，这个小社区是一种有着“情感、传统和自身历史”的地方。（Park, 1916, p.583）在芝加哥学派进行的社区调查中，将调查对象分为若干可区分却又联系着的自然区域构成了其人文生态视角的一个关键前提。（Abbott, 1997）事实上，燕大社会学人在营建试验区的同时，也提供了作为同时代学人的芝加哥学派的回响而非继受，赵承信等

^①“社区政治或行政已渐由士绅之领导，进向知识青年之推动。领导作用已渐由有门第和财富力量的人，交代给有训练的人了。如果问甲乙两社区政治活动有何不同，其不同就在于这交代程度之深浅。”（蒋旨昂，2023，第63页）

学者对人文生态学的思考即是典型的一例。

从1933年底开始,出自燕京大学、年岁相仿的赵承信和徐雍舜以全面介绍人文生态学的方式来总结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个10年。赵承信以《介绍几种人文区位学的研究》为题,分五期连载,介绍了10年来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学代表作。(赵承信,1933)而徐雍舜则在1934年的“社会思想”副刊中,分两期分别介绍人文生态学的基础概念和区位的历程。(徐雍舜,1934)

撰写这一系列连载的时候,赵承信刚从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来,而在此之前,赵承信曾在芝加哥大学(简称“芝大”)短暂求学,那时候正是第一代芝加哥学派在派克和伯吉斯的指导下发展自然区域等概念的高潮。1932年来燕大讲学的派克也在1933年从芝大退休,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以他指导的博士论文研究为主体的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落幕,赵承信的总结可谓正当其时。

按照芝加哥学派的纪年,1923—1933年的确是非凡的10年。1923年,芝大在阿尔比恩·思默(Albion Small)的倡导下成立了著名的“地方社区研究委员会”^①。(Lazarsfeld,1993)同年,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在《美国社会学社通讯》上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模式。1923年,派克的学生尼尔斯·安德森(Nels Anderson)的作品《流浪工人:关于无家可归者的社会学》正式出版,这预示着以芝加哥城市社区为对象的经典芝加哥学派民族志研究,将迎来成果丰硕的十年。

作为“地方社区研究委员会”的成果之一,《芝加哥:一个社会研究的试验》文集在1929年出版。赵承信认为,该文集中与人文生态学相关的论述,首推派克所作的《作为社会实验室的城市》一文,而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对“自然区域”的清晰阐释。(赵承信,1933,2002)

按照派克的理解,将如城市一样庞大的人类聚落,拆分成若干自然区域之后,这些自然区域才是呈现社会差异和社会变迁最可靠的观察单位。例如,从一个自然区域到另一个自然区域的犯罪率变化、人口构成变化、社会越轨率变化等。(Park,1929a)派克想表明的是,自然区域之间的差别,或社会事物在自然区域之间的流动,才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社会风貌。换言之,某种水平的犯罪率和某种水平的家庭解组,在特定自然区域中就构成了某种风俗。这种风俗和节庆仪式、巫神、祭祀都不同,但它真实地体现着生活在该自然区域当中的人,而不是某种抽象的社会性质的指标。自然区域之间的边界,当然不是政区边界,也不再是任何人群聚落的边界,它是影响所有人的“风气”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变成“习尚”的载体。只不过,分析和理解这种新风俗的人,不是民俗研究者和新闻记者,而是能凝视自然区域的社会研究者。派克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让人难忘的精彩分析,即怎么将某种充满误导性的社会倾向,作为一种深刻反映人性的变化去观察。“自然区域”在字面上和“人为”或“功能”区域相区别,但其用意恰恰是将分布在人群中的社会特征视为在这群人身上长出的自然。如果自然区域的关键是社会风尚的流动,而不是从人的衣食日常中看到习惯,那么所谓的自然区域的边界就不是自然聚落的边界,它和“功能区域”也就似远实近了。新闻记者出身的派克很快在报纸媒体的流动中表明,阅读什

^①在就任1962年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讲《关于经验性社会研究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当中,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简洁地回顾了集中从事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大学的关系。事实上,早在该委员会成立之前,米德就在1914年和芝加哥的城市俱乐部向芝大发起了成立专门研究所的呼吁。1922年,思默本人也对来自芝大商学院的同一呼吁深表赞同。有意思的是,拉扎斯菲尔德在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该委员会的存在,相反,他认为在1920年代早期,无论是思默,还是声名鹊起的政治学系教授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都没有能让芝大接受成立类似机构的提议,而派克的到来最重要的意义,则是让博士论文的训练成为院系的要求而不是特定教授的判断力,这就开启了博士生综合训练的第一步。(Lazarsfeld,1993,pp.265-266)

么样的报纸，也是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区别。^① (Park, 1929b)

就在这同一本文集中，和派克一起合作推动了经典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却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自然区域”概念，伯吉斯所看到的“自然区域”就是“登记区” (census zone) 的聚合。按照平均五分之一平方英里的大小，芝加哥可以分为100多个满足基本入户调查和人事登记的登记区，而这些登记区可以根据自然状况和社会分化，再聚合为80个“自然区域”。在伯吉斯看来，以这种方法，学者可以获得利于开展田野调查、充分收获资料的空间划分。(Burgess, 1929) 在伯吉斯看来，自然区域概念中的“自然”，不是居住者长时间形成的生活习惯，而是一种只有通过现代调查才能被发现的生活痕迹。

任何城市都有基于功能的空间划分，但并不是任何社会关系的空间分布都会构成自然区域。自然区域的根底，的确是同心圆模式揭示的人口流动和继替。贫民窟、犹太区等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的文化渊源和政治影响，而是因为其处在过渡圈的生态动力上。自然区域是一个彻底的人文观念，因此在根本上不相信风俗制度的决定意义。基于生态位置和经络 (nexus) 而产生的民之性情是更深刻的人性。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学者无形当中走出了一条和孙末楠 (William Graham Sumner) 彻底不同的道路。^②

赵承信将伯吉斯提出的城市“同心圆” (他称之为“五道圈”) 模型视为自然区域的理论基础，同心圆的每一个“圈”固然构成了一个自然区域的空间形式，但不是实质。内城区和居住区可以表达在不同的社会倾向之中，将每一道圈内的某项社会状况的分布搞清楚也是对自然区域概念的运用。^③ 例如，派克和伯吉斯的學生，克利福德·肖 (Clifford Shaw) 在1929年出版的《罪区》 (Delinquency Areas) 一书，就是将“自然区域”运用到犯罪率研究的例子。作为芝加哥学派中代表性的犯罪学家，肖的这本书其实是用犯罪率变化、犯罪率与其他社会趋势 (人口增长率、贫困率等) 的关系，来论证同心圆中的每一道“圈”是不是构成一个独特的犯罪和越轨的世界。而每一道圈对犯罪和越轨的影响，独立于在其中生活的人群的文化特征。(赵承信, 1934) 肖的描述颇近于今天城市研究中所谓的“邻里效应” (neighborhood effect)。^④

1936年，赵承信发表了他在社会学史上最著名的文章之一——《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派克式的社区民族志总结为对以“制度”和“自然区域”为经纬编织出的研究方向。(赵承信, 1936, 第203页) 在城市环境当中，特定人群居住生活的“居民区” (ghetto) 就是这种自然区域的代表。(Park, 1926; 帕克等, 2016) 而另一位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代表学者，路易斯·沃斯 (Louis Wirth) 的作品《犹太区》 (The Ghetto, 赵承信译作《犹太窝》) 也被赵承信视为“自然区域”概念运用的典范。不过，在赵承信看来，这本书的贡献在于其描述自然区域变动的方法，这归结起来就是人文生态学的“分隔” (segregation)。从中世纪到1920年代的美国犹太区，犹太人从一种志愿的分离居住，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分离，但在这个过程中，犹太区内

^① 林德纳精到地指出，派克笔下的城市，以及他推崇的“看”社会的方法，是他改变芝加哥学派民族志的两个最关键的方面。(Lindner, 1996)

^② 派克在燕大讲学的时候，尤其重视其前辈，以《民仪》 (Folkways) 一书闻名的孙末楠 (William Graham Sumner)。(田耕, 2023, 第108~109页) 李安宅将其论孙末楠的文章译成了中文《撒木讷氏社会观》。(李安宅, 1932)

^③ 在重返芝加哥学派的经典城市民族志时，学者们发现经典民族志的理论成就之一，不在于对越轨、边缘及流动的描写，而在于对区域单元本身的理论性思考。同时，学者们也发现，在芝加哥学派民族志对城市的描绘 (mapping the city) 当中，其实包含了不同尺度的空间概念，广为人知的“同心圆模式” (concentric model) 只是其中之一，而描绘城市本身又是城市社区的社会学与城市设计 (urban planning) 之间的重合地带，是两种基于城市的空间概念的交汇。(Merriman, 2015; Venkatesh, 2001; Light, 2009; Owens, 2012)

^④ 芝加哥学派对芝加哥社区邻里 (neighborhoods) 的调查、描绘和分析，不仅留下了如“邻里效应” (neighborhoods effect) 这样的分析遗产，(Sampson, 2012, pp.31-50) 而且留下了是否可以通过设计社区邻里来再造城市的永恒问题。(Talen, 2019)

社会生活的活力和独特性也因之而不断发展。犹太区生活网络发达，再加上其与其他社区的界限感相互强化，使得犹太区成为自然区域、文化区域和制度的三位一体，而这种三位一体是赵承信理解人文区位学，并将之用于燕大社会学建设的关键点。^①

之所以在1930年代初期，燕京学人对同时代的经典芝加哥学派的总结值得重视，除了他们难以复制的同时代性质，还因为这样的总结也促成了新的研究意识，促使学者反思观察者在田野研究中的位置，这是本文所谓试验区的试验性的一部分。

1938年，决定暂不南迁的燕大社会学系在年末组织部分师生重游清河镇，原属于清河试验区的平郊村成了重启乡村田野工作的理想地点。在平郊村进行田野工作的师生在1939年的7月以入户访谈的形式开始，暑假中的燕大教师保持着一周四五次下乡的密度，而大四学生在寒假的时候则搬到了平郊村居住。在第一批进行平郊村研究的本科生毕业之后，社会学系调整了课程的方案，大三的学生在学习“社会研究法”这门课的时候就进入了平郊村实习，以期在大四独立工作的时候对社区更为熟悉。如果不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平郊村也许会成为燕大社区研究发展的转折点。

表2 燕京大学“平郊村”研究的部分成果

作品	作者	出处	导师
平郊某村政治组织	沈兆麟	燕大法学院社会学学士论文 1940年5月	黄迪
北平北郊某村妇女地位	陈涵芬	燕大法学院社会学学士论文 1940年5月	赵承信
平郊村的庙宇宗教	陈永龄	燕大法学院社会学学士论文 1941年5月	杨堃
平郊村的住宅设备与家庭生活	虞权	燕大法学院社会学学士论文 1941年5月	杨堃
平郊村之农具	邢炳南	燕大法学院社会学学士论文 1941年5月	黄迪
平郊村之乡鸭业	方大慈	燕大法学院社会学学士论文 1941年5月	黄迪
平郊村一个农家的个案研究	韩光远	燕大法学院社会学学士论文 1941年5月	黄迪
前八家村之徐姓家族	刘秀宏	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	林耀华
平西村农事劳动研究	张宗颖	燕大社会研究所社会学学士论文 1947	赵承信
平郊村农工之分析	蔡公期	燕大法学院社会学学士论文 1947年5月	赵承信
平郊村一个手工业家庭的研究	杨景行	燕大法学院社会学学士论文 1948年5月	林耀华
平郊村学龄儿童所受的教育	张绪生	燕大法学院社会学学士论文 1948年5月	林耀华
平郊社区妇女研究	詹宝真	燕大法学院社会学学士论文 1947年6月	雷洁琼
平郊一个小区教育的调查	薛素珍	燕大法学院社会学系文学士学位论文 1948年6月	雷洁琼
四大门	李慰祖	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社会学学士 1941年5月	杨堃

在时间上，平郊村试验区的启动距离清河试验区的开始正好10年。但对赵承信来说，他试图在平郊村发展的是一种不同的试验性。赵承信借用了这个时期社会学的“实验室”（laboratory）之说，在他的设想当中，“社会学实验室”和“试验区”最大的不同是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构成的现实进行的控制。所谓控制，就是把研究者的所言所行和被研究者的行动都视为研究的客观现实，对之分别加以客观化的努力。研究法的实验，“就是现查员（investigator——笔者注）与村民的交互动作的一方面”，而村社区生活的实验，“就是村民彼此交互活动的一方面”。

在研究法的实验当中，研究者须对研究者的喜好和偏见更加明白，明白这种偏好才知道偏见的由来。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喜好会导致社区观察者进入特别的研究关系里面，这种关系是研究者需要面对的现实。调查者的喜好偏向必然导致进入社区和观察社区的不同，而这一点或许是“社会学实验室”第一个要控制的对象。

^①沃斯对犹太区在欧洲和美国历史中的长时段描述与比照，使得这个概念相当程度上脱离了欧洲犹太历史的语境，这当然也是“自然史”说法的含义之一。赵承信捕捉到了犹太区就是作为自然史的隔离这一点，影响了自派克开启的整个一代芝加哥学派的年轻学者。到了1940年代，霍勒斯·凯顿（Horace Cayton）和圣克莱尔·德雷克（St. Clair Drake），和因写作《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而较早引入中文世界的威廉姆·怀特（William F. Whyte），对沃斯的自然史意义上的分隔提出了深刻的挑战。（Duneier, 2016, pp.34-75）

“在平郊村研究的进程中，研究员就是现查员，他们是学系的研究助理，研究生，和四年级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社区，有着不同的群体关系和人格因素，一旦到了实验室的社区之后，现查员的一切群体关系和人格因素就会在与村民发生关系的时候表现出来了。脾气相投的现查员和村民就常会彼此吸引。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弱点，因为在这种关系之中取得来的材料就难免主观的色彩了。但这也有好处的，那就是现查员能够深入村民生活的全面。在这种研究活动或研究关系里，研究指导者要特别注意和分析现查员的社会关系和人格因素，而且要随时指示给现查员指代他个人的主观和偏见。”（赵承信，1948，第114页）

在平郊村研究当中，社区观察对研究对象的实验包括了记录村社区的人事、组织和物具三个方面。赵承信的记录方案里没有那么重视人口描述，其关于物具的描写观察也并不特别留意乡间的仪式和行动，而更为关注制度，即村社区中社会关系的结晶。

对于如何完整记录三个方面的社区生活，赵承信并没有给出详细的方案，但他认为，从研究者的实验到村社区的实验之后，理想的社区研究才会真的开始。关于对社区观察的记录，赵承信认为研究者应先体会社区的自然生活，再开始用专门的调查表格进行记录。燕大社会学系在两年多的时间之内编制的表格多达20多种，但赵承信很清醒地看到，记录工作的难点不在于记录手段。从工作的程序来看，调查者在进入平郊村的村民生活半年之后才开始编制调查表格，编制表格的过程固然不容易（须经“社会学系全体教员、助理和平郊村小学校长多次讨论，多次修改才决定”），但调查人更是不能直接持表开始入户访谈，而须“得到村民生活经验相当时期（三个月至六个月）”之后，才有机会得到表格用处的解释。（赵承信，1948，第112页）这样做的目的恰在于一种客观化，也就是把表格所代表的调查意图放在经验中得到的乡村生活里面。赵承信这种研究的自觉意识和同一时期杨堃领导的、在平郊村进行的礼俗研究构成了明显的差别。^①

五、结 语

毋庸置疑，试验区是早期中国社会学历史的一个独特的方面，如何在学术史上更充分地看待以试验区形态进行的社会学研究？试验区作为集中体现学科和学派的研究取向，其组织历程、人事变动、学术产出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将试验区作为学术组织个案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其试验性的核心。本文指出，作为田野的社会学试验区，并不只是一个开放给学术和改良试验的空间，而是潜藏于社区的生活模式和特定的观察社区的“眼力”之间相互构造的空间。试验区提供的并非学术和社会干预之前的自然生活，而是某种在反复观察的民族志凝视下出现的社会生活。这种民族志的凝视本身，而不是风俗的凝聚，是本文所谓试验性的关键。^②怎样在学术史的钩沉当中揭示这样的试验性，而这样的试验性会如何改变我们对早期中国社会学史的认识，从而申发中国学术的内在机理，这是本文的意图所在。

因此，本文以早期燕京大学的试验区为例，从整体学术语境、观察行动和田野概念反思三个角度尝试对试验区的试验性做出初步的阐发。本文首先表明，燕大社会学第一个试验区清河试验区的建设是出于燕京社会学人乡村研究的整体规划，同时也和南迁之前的燕京社会学派的课程结

^①关于燕京学派在南迁之前更具有民俗分析色彩的研究，参见岳永逸的《始终：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岳永逸，2023，第185~190页）

^②需要指出的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实地研究，都潜藏着如何处理风俗的倾向，这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田野工作的一个入手点。（王利平、杜月、田耕，2025；岳永逸，2023，第127~155页；田耕，2024；张帆，2025）

构具有内在的呼应,即使从狭义的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清河试验区体现的也不止是一个发展实地研究的主张。其次,试验性体现在研究者的观察行动,因此其看待社区生活的切入点和主题性都值得重视。燕京学派从清河试验区开始,注重对市镇和乡村作为社区的分野与联系,体现了高度的社会学敏感。一方面,市镇和乡村的连接性关系在至少三个研究脉络中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本文以蒋旨昂对乡村权力的微观观察为例,表明其田野观察的视角不仅直接关注同时期的基层自治问题,而且大幅减少了对乡村风俗的观察力度。最后,本文指出,试验区促使研究者对田野的概念和田野工作本身进行反思,本文以赵承信在1930年代的论述为代表,说明燕京社会学人对“自然区域”概念的反思,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研究者的自我控制是进入社会学试验的关键。

简而言之,本文把试验区或是一般意义上的田野工作点不仅视为一个实在的时空,也看成社会学试验观察方式的空间。当我们重访经典作品的田野点,一个关键问题仍是,社会研究怎么把自身所在的空间作为社会关系展开和存在的形式?我们可以把本文所初步阐释的试验性,推向中国社会学史的不同的田野点之间或是同一田野点的不同社会研究之间的比较,这或许是理解中国社会学生长的一个入手点。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滨岛敦俊:《江南的聚落、社区与农民共同关系》,《社会》2007年第3期。
3. 杜正贞:《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
4. 费孝通:《苏南行》(1987),载《费孝通全集》(第12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 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1984),载《费孝通全集》(第10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 傅春晖:《早期燕京社会学的人文区位学研究——以杨庆堃的〈邹平市集之研究〉为例》,《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5期。
7. 谷芭:《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一个社区行政的实地研究》,《自由论坛》1943年第1卷第5—6期。
8.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 胡庆钧:《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0. 黄迪:《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社会学界》1938年第10期。
11. 侯俊丹:《制度变迁下的知识治理:早期燕京学派的清河试验》,《学海》2017年第5期。
12. 侯俊丹:《市场、乡镇与区域:早期燕京学派的现代中国想象——反思清河调查与清河试验(1928—1937)》,《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3期。
13. 蒋旨昂:《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14. 李安宅:《社会问题研究及调查机关之介绍(九)——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概况》,《国际劳工消息》1933年第2期。
15. 李安宅:《撒木讷氏社会观》,《社会学界》1932年第6期。
16. 李树青:《悼念业师潘光旦先生》,《明报月刊》1984年第4期。
17. 李树青:《纪念杰出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传记文学》1985年第1期。
18. 罗伯特·帕克、欧内斯特·伯吉斯、罗德里克·麦肯齐:《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杭苏红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19. 牛和清:《民国时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1931—1937)》,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1年。
20. 瞿同祖:《俗、礼、法三者的关系》,《北平晨报·社会研究》1934年4月25日第1版。

21.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2. 沈博:《北平社会调查所对清宫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基于学术转型视角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5期。
23. 陶孟和:《北平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载《孟和文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a。
24. 陶孟和:《社会调查》,载《孟和文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b。
25. 田耕:《中国社会研究史中的西南边疆调查:1928—1947》,《学海》2019年第2期。
26. 田耕:《交错继承的学术传统:以抗战期间的一些边疆研究为例》,《学海》2023年第2期。
27. 田耕:《“县”的观察与建设:重返李景汉的“定县调查”,1928—1944》,《北大政治学评论》2024年第17辑。
28. 王利平、杜月、田耕:《风、俗与生机:芝大和燕京的社会学田野》,《读书》2025年第5期。
29. 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社区方法论》,《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
30. 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31. 王铭铭:《局部作为整体——从一个案例看社区研究的视野拓展》,《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
32. 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社会研究》1935年第101期。
33. 许仕廉、杨开道:《清河:一个社会学分析》,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34. 许仕廉:《附录二:燕京大学社会学面面观》,《社会学界》1933年第7期。
35. 徐雍舜:《人文区位学的基本概念与体系》,《益世报》(天津)1934年4月30日、5月7日。
36. 杨堃:《中国社会学发展史大纲》,载《社会学与民俗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37. 杨堃:《社会学研究法》,《中国学报》1944年第1期。
38. 杨开道:《燕京大学农村建设工作》,载《乡村建设实验》(上),李善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39. 岳永逸:《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40. 张帆:《以风土记反思民族志》,《开放时代》2025年第2期。
41. 张鸿钧:《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镇社会实验区工作报告》,载《乡村建设实验(上)》,李善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42. 赵承信:《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社会学界》1936年第10期。
43. 赵承信:《介绍几种人文区位学的研究》(之二),《益世报》1933年12月18日第3版。
44. 赵承信:《介绍几种人文区位学的研究》(续),《益世报》1934年1月8日第11版。
45. 赵承信:《派克与人文区位学》,载《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6. 赵承信:《平郊村研究的进程》,《燕京社会科学》1948年第1卷。
47. 赵大琳:《从村庄到市场:施坚雅中国市场体系理论的华西社会学背景》,《中国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
48. 《社会学系近十年概况》,《燕京社会科学》1948年第1卷。
49. 《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系1932—1933年度报告》,载《燕京大学学术期刊汇编:社会学卷》第4册,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50. 《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系1933—1934年度报告》,载《燕京大学学术期刊汇编:社会学卷》第4册,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51. Abbott, A., “Of Time and Space”, *Social Forces*, 1997, 75(4): 1155–1157.
52. Bulmer, M., “The Methodology of the Taxi-Dance Hall: An Early Account of Chicago Ethnography from the 1920s”, *Urban Life*, 1983, 12(1).
53. Burgess, E., “Basic Social Data”, In T. V. Smith & Leonard White (eds.), *Chicago: An Experiment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54. Camic, C., “On Edge: Sociolog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New Deal”, In Calhoun, C. (ed.),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55. Chiang, Y.,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6. Daston, L., “On Scientific Observation”, *Isis*, 2008, 99(1): 97–110.

57. Duneier, M., *Ghetto: The Invention of a Pl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6.
58. Fei, Hsiao-Tung, "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46, 52(1): 1-17.
59. Gieryn, T. F., "City as Truth-Spot: Laboratories and Field-Sites in Urban Studie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6, 36(1): 5-38.
60. Lazarsfeld, P., *On Social Research and Its Language*, Edited by Raymond Boud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61. Lam, T.,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62. Light, J. S., *The Nature of Cities: Ecological Visions and the American Urban Professions, 1920-196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63. Lindner, R., *The Reportage of Urban Culture: Robert Park and the Chicago School*, Translated by Adrian Morr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64. Liao, T., "The Rape Markets on the Chengtu Plai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46, 28(4): 1016-1024.
65. Li, A., "Notes on the Necessity of Field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1938, 1(1): 125-126.
66. Merkel-Hess, K., *The Rural Modern: Reconstructing the Self and State in Republica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67. Merriman, B., "Three Conceptions of Spatial Locality in Chicago School Sociology (and Their Significance Toda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2015, 46(2): 269-287.
68. Owens, R., "'Laboratory Talk' in U.S. Sociology, 1890-1930: The Performance of Scientific Legitimac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50(3): 302-320.
69. Owens, R., "Mapping the City: Innovation and Continuity in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1920-1934",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2012, 43(3): 264-293.
70. Park, R. E., "The City as a Social Laboratory", In T. V. Smith & Leonard White (eds.), *Chicago: An Experiment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a.
71. Park, R. E., "Urbanization as Measured by Newspaper circ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9b, 35(1): 65-79.
72. Park, R. E.,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16, 20(5): 577-612.
73. Park, R. E., "The Concept of Position in Sociology",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1925, 20: 1-14.
74. Porter, T., "Reforming Vision: The Engineer Le Play Learns to Observe Society Sagely", In Lorraine Daston & Elizabeth Lunbeck (eds.), *Histories of Scientific Observation*,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75. Recchiuti, J. L., *Civic Engagement: Social Science and Progressive-Era Reform in New York Ci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6.
76. Rodgers, D.,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77. Ross, 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78. Sampson, R.,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79. Talen, E., *Neighborho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80. Venkatesh, S., "Chicago's Pragmatic Planners: American Sociology and the Myth of Communit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001, 25(2): 275-317.

责任编辑 毕然

Mao Zedong's "On New Democracy" as A Social Theory:

Insight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Social (Sociological) Theory (84)

Chen Xinxiang¹, Fang Huaming², Dong Shuhao³

(1.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2.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3.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Ethn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01*)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Mao Zedong's "On New Democracy" as a classic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sociology,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first demonstrates that the New Democracy theory aligns with the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thus it can be analyzed as a model of sociological theory. Secondly, we sort out four core elements of this theory, including the theoretical purpose,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stages, the interaction within the world-system, and the class position, and point out that these four aspects a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why the New Democracy theory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Finally, this study refines the "diamond model" as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social theory. This model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urpose, time, space, and position in theory construction. Overall,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of "On New Democracy"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China's social science theory and also offers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new democracy; social theory;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independent knowledge product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Why Does Experimental Area Have Experimental Nature?

A Preliminary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Early Yenching Sociology (96)

Tian G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While the role of "experimental area" has been appreciated in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what made it experimental remains a question. Using the Qinghe Experimental Area (QEA)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traced the sources of its experimentality to the research contexts, the observational acts it intrigued and the researchers'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related concepts.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QEA was part of the broad rural study program in the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Yenching's sociological curriculum structure at that time. The exemplary village ethnographies grew more out of interests in micro power structure than of the rural folkways. Lastly, the paper retrieved the scholarly reflection on the concept of "natural area" which led up to the proposition of self-control on fieldworkers.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area as contestation site for different sociological visions might help rewriting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sociology.

Key words: experimental area; experimentality; ethnographical gaze; natural area